

歷史與空間

■文：吳小彬

理性的無奈

今年8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00周年，斯蒂芬·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為我們講述了當年的歐洲。

茨威格是奧地利人，1881年生於維也納一個猶太富商家庭，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有傑出的文學天賦，並有極好的運氣，初次向報社投稿即被刊用，此後一帆風順，成為知名作家。

可這種舒適的生活和好運氣，被大戰的炮火摧毀了。茨威格無限留戀地寫道，1914年以前，連續40年的和平使各國經濟充滿活力，技術加快了生活節奏，城市越來越大，越來越漂亮。資本家和猶太商人盛裝打扮，走進劇院欣賞歌劇，並熱衷把孩子送進大學，希望他們至少有一個獲得博士學位。浴室、電話進入了小資產階級家庭，自從工作日縮短以後，無產階級也漸漸富裕。誰想有所作為，誰就能獲得成功，誰買進一幢房子或一幅畫，誰就會看到行情不斷上漲，到處是一派無憂無慮的美好景象。

但是，也許正因為財富和技術的積累與飛速進步，燃起了人們更多的物慾，人們指望獲得更多的利益。沒有誰料到，使人不勝欣喜的事物也孕育着危險。各方面的繁榮太快了，那種渾身是勁的感覺也總是誘發人使用甚至濫用力。法國已富得流油，但它還要攫取更多的財富，意大利、奧地利也是這樣，塞爾維亞把矛頭指向土耳其，迅速崛起的德國，更是躍躍欲試，準備大幹一場。每個國家都在張揚自身的強大，卻忘了別的國家也有同樣的情緒。歐洲到處都怒氣衝衝，劍拔弩張。

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被刺殺。茨威格回憶說，斐迪南大公並不受人民喜愛，在劇院看戲時，他坐在包廂裡，威風凜凜，但一雙冷冰冰的發呆的眼睛，從不友好地看一觀觀眾席。他被刺的消息只在很短的時間裡讓人震驚，兩個小時後，人們又和往常一樣談天、歡笑。但事情就是這樣蹣跚，此次刺殺在各國間一番頻繁卻無果的交涉後，引發了世界大戰。

戰爭爆發時，茨威格32歲，因為身體健康欠佳，暫不服兵役，這讓他感到高興。可他在精神上是孤獨的，周圍充滿了好戰、樂觀的英雄主義腔調。他被安排在軍事檔案館裡做事，一個偶然的機會，被派往前線收集交戰國的宣傳品。作者因此親眼目睹了被炸毀的城市和鄉村，被搶劫一空的商店，流離失所的難民，在押解途中的目光呆滯的戰俘，躺在麥秸上的傷兵。一列原本運送牲口的火車被用來轉運傷兵，車廂裡充斥着尿、糞及黃碘的濃烈氣味，

一些軍人的屍體就橫臥在傷員之中。這種種慘狀，加重了作者對戰爭的反感。

1914年秋，羅曼·羅蘭發表《超脫於混戰之上》，抨擊國家之間在精神上的仇恨，要求藝術家即使在戰爭中也要主持正義和人道，文章在歐洲引起強烈反響。茨威格說，這在當時是一件大事，那時世界的道德良心還沒有像今天這樣衰竭、乾涸，它會以傳統信念的全部力量對任何謊言和破壞人道的行為提出抗議，而大眾的心靈和耳朵也還沒有被從收音機傳出的胡說八道的浪濤淹沒，一個偉大作家的宣言，比那些政治家演講的影響大千倍。政治家的演說多是針對時局的策略，人們相信文豪和作家才是代表純粹思想觀點的最優秀的公民。

茨威格開始寫劇本《耶利米》。耶利米是《聖經》中的人物，被稱為「流淚的先知」，因為他明知猶大國遠離上帝後的悲哀命運，卻不能改變人們頑梗的心。作家感到，他對耶利米形象的悲劇性從未理解得像當時那樣深。他並不想把此劇寫成一部簡單的「和平主義」戲劇，僅僅宣傳和平比戰爭好，而是描寫一個在狂熱的時刻被人蔑視，被看作軟弱、膽怯的人，但在失敗時卻又證明自己是唯一不僅能忍受失敗且戰勝失敗的人。作者想表現這樣兩個主題，任何形式的權勢都會使一個人冷酷無情，任何勝利都會使全體人民思想麻木。戰爭正在進行，當別人還在不假思索、洋洋得意地證明自己必勝之時，茨威格卻把自己拋進失敗的深淵，並尋找着救贖的微光。

作者寫《昨日的世界》時，已是1940年，那時第二次世界大戰也爆發了，作者流亡到美洲。忍受着心靈的巨大痛苦，他寫道，1916年創作《耶利米》，我觸及了自身一直未加留意的地方，即在血緣、傳統上和猶太人的命運聯繫。猶太人不斷被各個民族戰勝，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驅逐，然而，由於一種神秘的力量——用意志改變失敗的力量，使他們無數次經受住考驗生存下來。我們的先知，難道預先不知道被歧視、被驅趕的命運？那種命運今天又使我們像糠粃一樣被扔在大街上，難道他們沒有忍受屈服於暴力的羞辱？甚至把失敗讚美為一條去見上帝的路？

用這部戲劇，作者改變了以前讀者對自己的印象——「一位令人愉快的作家」。他覺得這部劇作才是自己的第一本書，他用這部書傾訴哀腸，同時也說出猶太民族的苦難心聲。與先知心靈上的交流，以及創作的艱辛，幫助作者度過了一戰中最困難的時刻。24年後，茨威格寫《昨日的世界》，也



■ 斯蒂芬·茨威格

網上圖片

許是想通過回憶和筆墨，減輕歐洲文明被法西斯徹底毀滅在自己心裡造成的絕望與痛楚。然而，這一次，他沒有成功。1942年2月，他和妻子在寓所服毒自殺。

初秋讀此書，我一會隨作者的筆觸進入百年前的歐洲，一會又不由自主回到危機四伏的當下，我不能不為人類的健忘和理性的孱弱而歎惜。有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人用談判和說理的方式化解彼此爭端的能力還是那麼低，用外交與和平的手段消除仇恨及積怨的可能性還是那麼小。無論在南歐、中東，還是海灣地區，乃至東亞，到處都可以聽見充滿挑釁的談話，到處都有人怒目圓睜、蠻橫無理，到處都有歷史仇怨、領土紛爭，到處都在厲兵秣馬、磨刀霍霍。上億人的血幾乎是白流了，被染紅的海水、燒成廢墟的城市、屍橫遍野的慘景，還有兒童哭泣的眼淚，似乎都不能把人們從仇恨和奔向下一次戰爭的熱狂中拉出來。這時，我會想起當年卡夫卡的驚恐、里爾克的逃避、羅曼·羅蘭的疾呼、茨威格的傷感與無奈。

歷史表明，用戰爭解決國家之間的爭議是徒勞的，戰爭只會增加國家和民族間的怨恨，這一代人種下的惡果，終要由下一代或再下一代人來品嚐。人們應該警惕，有些政客打着民族主義和爭取國家榮譽的旗幟，其實是在為自己的政黨拉票，在為自己從屬的小團體利益服務。

文明發達的而今，人們真的應該學會克制自己的仇恨和怒火，平抑過盛的物慾及利慾。要明白，只展示肌肉，炫耀武力，或者打贏一場戰爭，並不能得到世人和歷史的尊重，人們真心敬慕的是主張和解、推進和平的人物，如納爾遜、曼德拉。

要經過多少曲折和屈辱的失敗，人類理性才能最後說服野蠻及嗜血的狂熱？這仍然是一道無解的難題。

書若蟬蛻

■文：葉輝

將詩集拋入河裡

話說呂叔湘在《書太多了》一文，說到約翰斯奎爾的《毀書》（On Destroying Books），又說此文乃「一個人事涉嫌疑時的心理狀態」，我讀《毀書》亦深有同感，此文寓莊於諧，約翰斯奎爾寫道：「書這東西，毀起來也不是很容易，有一回差點兒把我帶到絞架的影子裡。」說到要消滅太多的書，其實不免會有犯罪感，約翰斯奎爾乃愛詩之人，要消滅一批詩集，說來真是一步一驚心。

約翰斯奎爾說他其時住在一家公寓的頂層小套間，「不高明的詩集一本一本的聚集成堆，到後來我不得不在兩個辦法之中進行選擇：要麼把這些書趕出去，要麼把房子讓給它們，我自己另找住處。這些書賣不出去，沒人要。所以我只得把它們扔出去，或者把它們徹底消滅。可是用什麼辦法消滅呢？」

他的毀書之法其實挺麻煩：「縫了一個大口袋，把那些書塞進去，往肩膀上一背，走下樓梯，走進黑夜」，他決定要將這批書拋進河裡：「沒有人來。我走回家；邊走邊想，那些書掉進冰冷的水溜，慢慢的沉下去，最後停留在河底淤泥裡，無人理會，被人忘卻，無情的世界若無其事的朝前去。」

約翰斯奎爾寫此文時大概是寓莊於諧，諒不會那麼狠心吧（英文書名是我對照原文後加上去的）：「可怕的豎欄的書，可憐的無辜的書，你們現在還躺在那兒；現在已經蓋上一層淤泥，也許；也許有那麼一小塊麻布片兒從裝你們的麻袋裡伸出來，在渾濁的河水裡漂蕩。獻給達愛娜的頌歌（Ode to Diana），贈給愛賽爾的十四行詩（Sonnets to Ethel），以蘭斯洛騎士的戀愛為題材的劇本（Dramas on the Love of Lancelot），遠望威尼斯感賦（Stanzas on a First Glimpse of Venice），你們躺在那兒生不死，你們也許不該遭遇這樣的命運。我待你們太狠了。我很抱歉。」

呂叔湘深明這只是「把笑話當正經話來說」，他在《書太多了》一文寫道：「至於書多攔不下，我有切身的體會。並且我看《光明日報》的《東風》副刊上登的《我的書齋》系列文章，有不少是為不能把書全上書架訴苦。有人把書擱到衣櫃頂上，有人把書塞到床底下。我深深感覺，空間、時間、金錢這三樣東西可以交換。空間大，書擺得開，要哪本書，手到拿來；沒有這個條件，就只能拚時間，從櫃頂上、床底下一摞一摞取出來，一本一本找。」

把書擱到衣櫃，其實也是我年輕的經驗，有一段日子，住在類似劏房的斗室，只好將衣櫃權充書櫃，書太多了只好送給朋友，吾友古劍就接收了一些，記憶所及，當中包括余光中的絕版詩集、葉維廉所編譯的《眾樹歌唱》……此所以我對約翰斯奎爾的《毀書》所說的拋詩集於河中，真是感同身受——他說得好：「我要是告訴一個倫敦警察，說我冒午夜嚴寒偷偷的走到河邊，為的是擺脫一口袋詩集，他能信嗎？」

文藝天地

心靈驛站

■文：陸蘇

小小竹籃

現在很難見到挎着竹籃子的人了。也很久沒有見着有人提一竹籃子「大紅棗兒送親人」了。

那些芳名腰子籃、冬瓜籃、長環籃、茶籃的竹籃子，怎麼就沒了呢？是從前的竹園不長竹子改長塑料袋了嗎？

去山裡看看，竹子還是好好的在，只是那些會編籃子的篾匠師傅都老了，而本該繼承他的衣鉢的兒孫們因為竹籃子不好賣，手藝大都已是荒廢得一根竹篾絲都破不熟練了，哪個還想得起來編竹籃子呢？

那天回村，看到一女子提着一竹籃嫩蕃薯梗走出一個菜園。並沒有看清她的相貌衣着，只是覺得她左手挎籃子、右手撕着蕃薯梗上的葉子，施施然走着的樣子很美，和周邊的綠色很合，那隻竹籃子成了在她身上最精緻的部分，也是最動人的細節。

現在有那麼多人喜歡清亮的民謠，寬敞的布衣，嚮往陽台上有竹籬笆、有一畦十四行的小菜，恨不得把村裡的好空氣、好水、好光景都搬進城裡的陽台來，怎麼就不把竹籃子「喚取歸來同住」呢？它的家學淵源、氣質、胸襟、建築美，哪一點不比塑料袋優雅、時尚？

編竹籃子是一種技藝，也許有一天它還會成為一項文化遺產，但我想它需要的不是博物館裡的懷念，而是和我們

一起呼吸一起老的人間氣息。只有能為生活所用的物件，才和生活一樣久遠。

竹籃子是圓形書簡，裡面住着鳥聲啾啾，住着風花雪月，住着炊煙，住着一個村莊的歷史。

竹籃子是生活藝術品，攔着看看都養眼。在臂彎裡偃着的竹籃子散發着特有的嫺靜安然的煙火氣。靜坐着的竹籃子上瀰漫着對好菜好飯好日子的感恩和嚮往。

竹籃子多麼結實，一般的迎來送往一點都不會讓它衣帶漸寬，若有一天實在老得走不動了，還可以最後做熟一頓飯，紅紅火火地歸塵歸土，除了飯香，不留一絲痕跡。

從伸手挽起一隻竹籃子，回歸草本的生活，回歸簡單寧靜，回歸螢火、星光，回歸露珠、山嵐，回歸愛。



■ 竹籃

網上圖片

短載

■文：董耀會

京城鎖鑰居庸關——走過萬里長城之六



■ 居庸關地形形勢圖。

居庸關是萬里長城最負盛名的雄關之一，其地絕險。居庸關建在一條崇山夾峙、長達約20公里的溝谷之中，這條溝谷就是京畿著名的「關溝」。居庸關是北京北大門的進出之路，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今天雖然有了高速公路，但依然能感受到這條溝的曲折起伏。

居庸之名，據元代人記載，是秦始皇修長城時徙居庸徙於此而得名。庸就是強徵來的民夫士卒。其實居庸之名早於秦始皇統一全國之前，成書於戰國時期的《呂氏春秋》中就有「天下九塞，居庸其一」的記載。在著名的「太行八陁」中，居庸關排列第八，即控扼軍都山的軍都陁。

居庸關在漫長的歲月中，雖始終是兵防重鎮，卻屢易其名。三國時稱「西關」，北齊時改「納款關」，唐時先稱「薊門關」，後改「軍都關」。

由遼以後金、元、明、清至今，便始終稱居庸關。朱元璋建立明朝後，於洪武三年（1370）派徐達修築了居庸關城，這是明代修建長城關隘最早的記載。由此可見，居庸關戰略地位之重要。

現存的關城，城垣東達翠屏山脊，西抵金櫃山嶺，周長4000餘米。南北城門都有甕城，北門甕城呈半圓形，南門甕城呈馬蹄形。北門高大的城樓為南北向歇山三重簷磚木結構，南門關也有重簷歇山城樓一座。關城內外設有衙署、廟宇、儒學等各種相關建築設施。廟宇、牌坊為數眾多。

元朝時，皇帝每年來往於上、中、大都之間，因而在居庸關內設有行宮、寺院、花園等建築。現存的雲台是元代修建的過街塔台基，雲台券洞上雕刻的佛教圖像和梵、藏、西夏、維、八思巴、漢6種文字的經文，是

研究元代佛教、古代文字和各民族之間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雲台內的地面用近120塊巨石鋪成，因有行人及牲畜不斷從券洞內穿過，石塊被磨得光滑圓潤，地面還留下了明顯的車道印痕。由此可知歷史上的居庸關曾是車水馬龍，一片繁榮景象。

居庸關峽谷溝長谷深，自古就有「天險」之稱。居庸關發生過很多次戰爭，宋淳熙九年（1182），這裡曾發生鮮卑人攻打居庸關的戰爭。遼、金兩朝的滅亡，也發生在居庸關被攻克之後。遼代末年，金兵進攻居庸關，遼國調集重兵把守，金兵攻關時，遼兵隱蔽在懸崖下面，突然崖石崩塌，士兵被壓死許多，

便不戰自潰。元朝末年，朱元璋北伐的大軍破居庸關而入，直取元大都。到了明末，李自成率兵先打下宣府（今張家口宣化區），再入居庸，攻破北京城。

從居庸關在保衛北京的作用上，可以看出古人修築長城的一個重要原則——扼守要地。建設障、塞的目的是封關、設卡，阻擋進攻。障、塞建築地點一般選擇於咽喉要衝。由於王朝的政治中心在都城，軍事行動的首要目的是護衛政治中心。都城地點不同，其戰略要地也不同。秦漢時期，政治中心在長安一帶，通向長安方向的各條道路就成為了設置障、塞的重點，因此才有了北方的雁門塞、西北的居延塞等關塞。明朝的都城在北京，所以障、塞選址也發生了變化，出現了山海關、古北口、金山嶺、居庸關等要塞。明朝中後期，京城屢遭圍困，為加強京城護衛，把防禦重點放在了京北和西北方向，建造出「外三關」和「內三關」。

（節選自香港中和出版《走過萬里長城》）



■ 居庸關雲台。

試筆

■文：潘港浩（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台灣實習所歷所感

剛過去的六月、七月，我因參加學校所辦的「暑期職場體驗計劃（大中華地區）」，有機會在台灣生活、工作四十二天，其間無論是參訪名勝，抑或與當地人的日常交流，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台灣時，我在台北市士林運動中心擔任「小老師」，和同工一起負責帶領二十多名小朋友進行各類有益身心的活動，例如游水、打籃球、踏直排輪（就是香港人說的「踩roller」）等。別人都說：「這是相當考驗耐性的工作。」但可能是喜歡跟小朋友玩耍吧，我非常樂在其中，很快就跟孩子們打成一片，絲毫沒覺得辛苦或麻煩。倒是最初要跟家長聯絡，難免緊張，但小朋友的父母都十分隨和，聽了我介紹子女的活動表現後，還連連誇我國語說得好，「不說還不知道你是外地人！」令我很快從工作中找到自信，並逐漸培養出更好的溝通技巧、服務態度和團隊精神。

除了投入工作外，我和香港的同學也盡力把握空餘時間，在台北各處參訪，遊遍了各大夜市，也到了夢幻一般的六福村主題樂園。台灣的美食固然名不虛傳，台北人的待客熱誠，也無法不令人由衷讚賞。幾次我和同學不敢確定目的地方向時，熱心的本地人都會花時間向我們詳細解說路線，甚至親身帶我們前往該處；在六福村，知道我們是來自香港的學生，同樣青春的樂園員工更拉着我們大合

照，活像一家人似的。好客的台灣人，給了旅居此地的我們滿滿的暖意。

談到台灣，自然不能不提購書選擇的多元。不過，已儼如「旅遊名勝」的大型連鎖書店並非我的首選——因着香港老師的介紹，我獨鍾情鮮為旅客所知的雙連、中山捷運站地下書街。各種文、史、哲學以至消閒的書籍，在當中都以十分相宜的價格出售。店舖內一些並不忙於招呼客人的店員，更喜歡和我閒聊台灣青年的閱讀風氣，甚至分享自己最近都看哪些書，令捷運地下街的書卷氣、人情味更加濃郁。我特別認同其中一家店東說的：雖然書街的沉寂反映台灣閱讀氣氛正連年削弱，但出版界堅持文藝書籍的多種、多元出版，其經驗依然是值得香港參考的。入境觀風，反思我城，這也是「實習計劃」希望香港同學達成的目標之一吧！

實習的四十二天讓我更深入地認識了自己的專長、優點，但更重要的，是使我對台灣的文化有了切身的體會。感恩香港的余境熹老師給我詳述他豐富的旅台經驗，林燦森老師提點了許多交流應該注意的事項。士林運動中心的導師徐婉庭、彭昱翔，在工作上與我合作無間，是此行我結識的最要好的朋友——很多還未訪遍的著名景點自然給了我再往台灣的充分理由，但使我日夜心繫寶島的，實在是那份人與人之間的情。